



细讲中国历史丛书

主编 李学勤 郭志坤

隋唐五代史

孙英刚 著



隋唐五代三百七十余年间，最精彩的是盛唐时代。被尊奉为『天可汗』的唐太宗所说的『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乃是千古治道的精粹。盛唐是一个开放的时代，当时世界上唯一有百万居民的大城市长安成了『万国都会』，数十万使节、商人、留学生、僧侣出入其间，同时唐人也走向了世界。

版社



细讲中国历史丛书

主编 李学勤 郭志坤

隋唐五代史

孙英刚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隋唐五代史/孙英刚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细讲中国历史丛书/李学勤, 郭志坤主编)

ISBN 978-7-208-12634-3

I. ①隋… II. ①孙… III. ①中国历史—隋唐时代—通俗读物②中国历史—五代十国时期—通俗读物

IV. ①K24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53002号

总策划: 郭志坤

策划: 上海文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监制: 王兴康 朱锦川

出版统筹: 孙瑜

特约编辑: 郭泳

责任编辑: 孙瑜 周珍

美术编辑: 傅惟本

电脑制作: 郭剑华

地图绘制: 陈伟庆

地图审图号: GS(2014)1228号

· 细讲中国历史丛书 ·

李学勤 郭志坤 主编

隋唐五代史

孙英刚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14.25 插页 5 字数 236,000

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12634-3/K·2298

定价 48.00元

本丛书出版得到以下机构资助

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

本丛书是多人合作和集体智慧的结晶，特别得到中国国家博物馆及多个省市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相关部门对丛书中的历史地图进行了审核，在此一并表示谢意。

丛书中有个别图片因原出处无署名或署名不一，实难确定作者，待明确后再按相关规定支付作者稿酬。



董钦造鎏金“弥陀铜像”（隋代，西安博物院藏）



白瓷黑彩侍吏俑（隋代，河南安阳出土，河南博物院藏）



《步辇图卷》（唐代阎立本绘）



三彩骆驼载乐俑（陕西西安中堡村唐墓出土，陕西省博物馆藏）



《五牛图卷》（唐代韩滉绘，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韩熙载夜宴图卷》（五代顾闳中绘）



宴饮壁画（长安唐墓出土，陕西省博物馆藏）



唐代三彩釉女立陶俑（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唐代三彩釉陶三花马（陕西西安鲜于廉墓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注：封面彩图为《步辇图卷》（局部）。插页彩图未注明出处的均引自王仲华著《隋唐五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序 一

上海的郭志坤先生是我的多年老友。在十几年前世纪之交的时候，我同郭先生曾经有过一次非常愉快的合作，就是依照他的提议，共同编写了一本通俗讲述中国古代历史的图书，题为《中国古史寻证》，列入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名家与名编——世纪初的对话”丛书出版。当时没有料到，这本书印行后博得相当不错的反响，使郭先生和我都觉得所作的一番努力是值得的。

以这件事为契机，郭志坤先生同我有不少次机会谈起历史学的通俗化问题。我们都认为，有必要组织编写一套系统讲说中国历史，将学术界的丰硕成果推广于大众的图书。郭先生精心拟出规划，并很快约请到多位学养深厚的作者，形成老中青结合的团队，投入了撰写的工作，其成果便是现在这套“细讲中国历史丛书”。

“细讲中国历史丛书”从夏商周三代写起，一直到最末的王朝清朝为止，全套共十二册。这套丛书的编写，贯穿了两条原则：就书的性质和对象来说，是“面向大众”；就书的体裁与风格而言，是“通俗化”。我认为郭志坤先生的这两条提得好，也提得及时。

先说“面向大众”。我近些年在不同场合屡次说过，历史虽不能吃，也不能穿，似乎与国计民生渺不相关，实际却是社会大众的一种不可缺少的精神需求。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从事什么职业，处于何种身份，都会自然而然地对历史产生一定的兴趣，这或许可以说是人的天性使然吧。一个人活在世界上，不但要认识现在，也必须回顾过去，这就涉及了历史。我从哪里来，又往哪里去，是每个人都会意识到的问题，这也离不开历史。人们不能只想到自己，还总会考虑到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这就更应该了解历史。社会大众需要历史，历史学者自当“面向大众”。

抗日战争时期，历史学前辈钱穆先生在西南联大讲授《国史大纲》，所撰讲义一开头便标举：“当相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



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历史学者的工作任务，不应只限于自身观察历史、探索历史，更有责任把所认识、所了解的历史，原原本本地告诉广大的社会大众，使大家对历史有应有的认识和必要的了解。

特别是在今天，当我们的国家、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之际，尤其有必要推动历史学“面向大众”。中国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我们的先人创造了辉煌而且源远流长的文化，对人类的发展进步做出过丰富卓越的贡献。我们有义务把这样的史实告诉社会大众，提升大家建设祖国、走向世界的凝聚力和自信心，从而为今后人类的发展进步做出更多更新的贡献，这应当成为历史学者的襟怀和抱负。

再谈“通俗化”。“面向大众”与“通俗化”是结合在一起的，要想真正做到“面向大众”，历史著作就必须在语言和结构上力求“通俗化”。

说起“通俗化”，我联想到我国“二十四史”之首《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司马迁是学究天人的大学者，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典范，然而他撰著历史，引经据典，还是在通俗上下了很大功夫。比如他论述唐虞以来古史，自然离不开《尚书》，而他本人曾受学于《尚书》博士孔安国，亲得古文《尚书》之学的传授，然而他在引用《尚书》时，对于古奥费解的字词，都采用意义相同的字来代替，这应该说是在“通俗化”方面的重要创意。另外，司马迁还尽力将史事的叙述情节化，使之活现于读者眼前，无愧于历史家的大手笔。这都是后人需要学习的。

必须说明，“通俗化”并不意味着降低历史学著作的学术水准。相反的，编写“通俗化”的历史作品，实际是对作者设立更高的要求，绝不是轻易就能够做到的。在这里，我还想附带说一句，即使是专供学术界专业阅读的论著，其实也应当（而且也能够）写得简明流畅一些。不少著名的前辈学者，例如胡适、郭沫若、冯友兰等先生，他们的著作不都是这样的么？

“细讲中国历史丛书”是“面向大众”的，并且在“通俗化”方向上作了很大的努力。郭志坤先生还说过：“通俗，通俗，只有通然后能俗。”这也很有道理。这十二册书是一个整体，作者们在上下五千年的一个“通”字上花费了不少精力，对于内容的构架和文字作风也下了一番苦功夫，相信这套书的读者都会体认到他们的用心。

李学勤

2014年8月17日



序 二

我和李学勤先生在讨论历史学的通俗普及问题的时候，很自然回忆起吴晗先生。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吴晗以史学界权威和北京市副市长的身份，向学界提出：“要求各方面的学者、专家也来写一点通俗文章、通俗读物，把知识普及给民众。”吴晗不仅撰文提倡，向史学界游说，还亲自主编影响很大的“中国历史小丛书”。这段回忆让我们萌发了组织编纂“细讲中国历史丛书”的打算。

当我向李先生提交了编纂方案后，他认为，这对以史鉴今、以史资政、以史励人是极有意义的事，很值得编纂。随后，我们又把多年酝酿的编纂构想作了大致的概括：突破“阶级斗争为纲”和“残酷战争”描写的局限，注重于阶层、民族以及世界各国之间的友好交融和交流的记述；突破“唯帝王将相”和“否帝王将相”两个极端的局限，注重于客观反映领袖人物的历史作用以及“厚生”“民本”思想的弘扬；突破长期分裂历史的局限，注重阐述统一始终是主流，分裂无论有多严重，最终都会重新走向统一；突破中原文化中心论的局限，注重全面介绍中华文化形成的多元性和影响力；突破历朝官方（修史）文献的局限，注重正、野史兼用，神话传说等口述历史与文物文献并行；突破单一文字表述的局限，注重图文并茂，以考古文物图表佐证历史。

“细讲中国历史丛书”的编纂重在创新、面向大众和通俗化。李先生认为这一美好的愿望和构想，要付诸实施并非容易的事。他特别强调要组织专业队伍来撰写，并提出“让历史走向民众是史家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令我欣喜的是，精心撰写这部“丛书”的作者本身就是教师。他们中有的是学殖精深、卓有建树的史学名家，有的是常年立足于三尺讲台的传道、授业、解惑者，有的还是以“滔滔以言”享誉学界的优秀教育工作者，其中多为年轻的历史学博士。由这样一个教师团队来担当编写中国历史读物的重任，当得起，也信得过。



我们把编纂的原则性方案统一后，在同作者商议时遇上了某些疑虑：一是认为这类图书没有多大市场，二是认为通俗作品是小儿科，进不了学术专著之殿堂。经过一番调查分析后，我们取得了共识，一致认为，昨天的历史是创造明天的向导，从中可以汲取最好的营养，好的历史通俗读物是很有市场的，因为青年读者中普遍存在一种历史饥饿感。本套“丛书”的作者深感，编写中国历史通俗读物，历史工作者最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和义不容辞的责任。旅外学者得悉我们在编纂这套“丛书”，认为这是很有价值的，也很及时。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历史学博士张德文参加撰写并专门来信期待我们早日推出这套丛书。信中说：“在知识大众化、数字化的年代，历史学者不应游离在这个历史进程之外。个人电脑以及智能手机的普及，大大促进了微知识的渴求。在此背景下，历史学者的通俗表述为微知识的传播提供了必要的积淀和范本。”行文虽然不长，但一语中的，说清了普及历史知识的重要性。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邹逸麟教授、华东师大历史系王家范教授等读了“丛书”的文稿后还专门撰文评说，认为这既是一套通俗的、面向大众的历史读物，又是一套严谨而富于科学精神的史著，对于广大读者学习和发扬中华民族的爱国传统、学习和发扬中华民族的奋斗精神，为推动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早日实现很有作用。

这一切，让我们得到莫大的鼓舞。作者在通俗方面作了极大的努力，他们中的不少人在写作中进行了刻苦再学习。从史实的查证，到篇章的构架，再到文字的通俗易懂以及图片的遴选，都花费了他们大量的时间和心血。丛书采用章节结构的叙史形式，目的在于从目录中就一目了然书中的大概内容。中国历史悠久，史料浩如烟海，读史者历来有“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读起”之叹，讲史时“以时间为纲”，即可以从纷繁中理出头绪来，再辅之以“专题为目”，这样在史料取舍上就更加突出主题、把握中心。细讲中注重故事取胜，以真实的历史故事吸引人、感动人、启迪人。图文并茂也是本丛书通俗化的一途。中国历来重视“右文左图”，以文注图，以图佐文。

通俗而雅，也是这套丛书的一大特色。雅者，正也。通俗不是低俗，亦不是庸俗，它是建立在科学和学术的基础上而展开的。把应该让读者知道的历史现象和历史观念用最浅显明白的方式告诉读者，这就是我们所需要并强调的通俗。本套丛书的学者们在撰写时一是力求在语言上的通俗，二是着力于情节中的通俗，继承和发展了太史公司马迁那种“以训诂代经文”的传统，把诘屈聱牙的古文经典用活了。所以说，深入浅出的通俗化工作更是一种学术活动。



为了增加生动性、可读性，作者尽量选择对某些有意义的人和事加以细讲，如对某些重大的出土文物的介绍评说，对悬而未解的疑问加以释惑，对后人误传误解的问题予以纠正，对某些典故加以分析，对某些神话传说进行诠释。在图表上尽量做到随文佐证。在每册图书之后增加附录，旨在增强学术性和通俗性：附录“大事记”，旨在对本段重大历史事件有个大致了解；附录“帝王世系表”，意在对本朝创业、守业和虚位之王的传承有所知晓；附录“历史地图”，在于对本段历史地理形势方位有个立体印象；附录“主要参考书目”，目的在于提供进一步学习本段历史的索引。

意愿和努力是如此，最终的结果如何？诚望读者鉴定。

郭志坤

2014年8月19日



导 语

经过三百年的分裂，中国在公元589年再次南北统一，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的隋唐时代。这个时代往往被视为中国文明的黄金时代。从制度创新上说，它开启的权力制衡的三省六部制、文官考试制度等，在世界文明史上也具有领先性，不但长期影响到中国历史的走向，更被周边国家所学习。从国力强盛上说，经过八十多年的战争，它奠定了东亚长期的政治格局。唐朝先后攻灭东、西突厥，并把中国的影响力拓展到中亚腹地。从宗教信仰上来说，当时东方世界中思想最为复杂繁密的佛教，已经逐步与中国文明不可分割，唐朝已经逐渐成为整个佛教世界的中心，沿着丝绸之路而来的高僧，其奔波而来的目的地往往是东方的佛教中心长安，如日本把佛教引入本国，各大宗派都视长安的某个寺院为自己的祖庭。从文学艺术上说，唐诗令人赞叹；跟佛教有关的俗讲推动了民间文学的发展；不论音乐、绘画、雕塑还是舞蹈，由于各种文明元素的融合，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从精神气质上说，盛唐包容、自由、浪漫、积极乐观的态度，展示出一个大国的气质。

佛教的传入，给中国文明带来了许多新的文化元素。不但绘画、雕塑、音乐、科技等各个领域都受到佛教的影响，而且佛教作为政治意识形态也影响了隋唐的政治活动。在传统的儒家天命学说之外，佛教有关理想君主、弥勒下生等理论和观念，给中国君主提供了可以选择的理论体系。隋文帝、武则天等隋唐君主，就在政治理念等方面，采用了佛教的一些元素，作为论证自己统治合法性的工具。比如隋文帝模仿阿育王分舍利建塔，而武则天更为自己加上了“金轮圣神皇帝”的头衔。

唐朝历史的转折点，是突然爆发的安史之乱。这场边防军人的叛乱，不但对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造成了沉重的打击，更对宗教、思想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随着河陇军等西北边防军的撤退，不但把苦心经营的西域放弃，更把首都长安直接暴露在吐蕃的战刀之下。此后唐朝一直在平定藩镇和对抗吐蕃、回纥、南诏等外敌中疲于奔命。安史之乱或明或暗地跟异族认同联系在一起，引起了唐朝思想界的转向。唐中期以后，要求回到中国古典文明的呼声日高，佛教也被视为外来文明因素，韩愈、柳宗元等倡导的文学、思想运动，以及唐武宗以行政暴力迫害佛教的举动，彻底瓦解了唐朝的佛教僧团体系，更将佛教从主流的意识形态和学术体系中清除出去。思想世界的变迁，改变了中国士人的价值观，连带文学格调、社会观念也发生了重要变化。

唐朝政治的一个重要层面，是贵族政治干预皇位继承。唐代前期的皇位继承，几乎都是以宫廷革命的形式完成。贵族大臣通过投机各个阵营谋取政治利益。玄宗即位之后，彻底改革了政治体制，尤其是裁抑了太子、亲王的势力，让他们成为宦官监视下居住的囚犯。唐代后期的君主即位，几乎由宦官决定，在带有人文主义色彩的科举士大夫阶层崛起之前，宦官作为皇权的延伸，在唐代中后期的政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另外，唐代是一个女性昂扬的时代，涌现了一大批积极参与政治的女政治家，包括武则天、太平公主、上官婉儿等。这跟唐代女性地位普遍较高，而且具有很大的社会自由有直接的关系。唐代的女性不知缠足为何物，甚至结社，这与后来受到理学压制的女性有重要的区别。如果考虑到有一半的人都从身体到心灵受到压制和毒害，那么这种区别可以视为唐宋时代发生的最为重大的事件之一。

富庶和安定是大唐盛世的又一大景观。大诗人杜甫是亲历了唐的全盛期的。他在一首题为《忆昔》的诗中写道：“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廩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这种富足现象，一方面与发展生产的种种措施有关，也与各族间的和睦相处有关。唐代一直都十分注重善处各兄弟民族之间的关系。唐中宗时把宗室女金城公主嫁给吐番赞普为妻。唐玄宗时期，在边境设立互市，加强唐与突厥等少数民族之间的经济交往。唐玄宗还将两个宗室女嫁给奚和契丹的首长，实现了“和亲”。原先归附的一些少数民族也进一步巩固了关系。

唐代的强盛在于它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唐代有许多国际化的大都会，而作为当时世界上唯一拥有百万居民的都城长安堪称“万国都会”，城中居住着数以十万计的外国使节、商人、留学生、僧侣。当时，与唐建立使节往来关系的至少有七十多国，其中包括日本、新罗、大食、罗马、印度、林邑等。一些外国人来到长安等



大都会后，不愿回国，在中国购买田宅，娶妻生子，落地生根了。新罗的崔致远、波斯李密医、大食的李彦升，还在唐王朝中当了高官呢！有时一年单是来华的使节就有万人以上，其中不只有亚洲人，还有欧洲人、非洲人。在长安出土了一尊孩童陶俑，头发高度卷曲，嘴唇十分厚实，专家认定是来自非洲的黑种人。唐朝人是大气而开放的，也是崇尚新奇的。可以说，外来物品渗透到了唐朝社会的各个阶层和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胡服、胡食、胡乐、胡屋，到处可见，真是“胡风”劲吹。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在长安城中有着一套舒适的豪宅，他在自己的后院中盖了一间“胡”式的帐篷，为了显示时髦，他老人家还把写作的桌椅也搬进了帐篷呢！连唐太宗的儿子承乾太子也背着父亲把自己打扮成突厥可汗的样子，坐在帐篷的狼头龕下抓食羊肉呢！

唐人认可了世界，世界也认同了唐人。在外国人世代相传的记忆里，在这块东方古土上居住和生息着的永远是唐人，于是，直到现今，世人将海外华人聚居的地方称之为“唐人街”，唐人成了中国人的一个代名词。读隋唐五代史，尤其是读唐史，会得到许多的启示和振奋。

